

四川灾区群众社会支持系统现状及其与主观幸福感的关系*

辛玫岭^{1,2} 吴胜涛^{2,3} 吴坎坎^{2,4} 王文忠¹ 张建新³

(¹中国科学院心理研究所危机干预中心, 北京 100101) (²中国科学院研究生院, 北京 100101)
(³中国科学院心理所心理健康重点实验室, 北京 100101) (⁴中国科学院心理研究所经济与行为中心, 北京 100101)

摘要 目的: 研究 5·12 汶川地震后四川灾区群众的社会支持系统现状及其与主观幸福感之间的关系。**方法:** 使用自编社会支持量表和简式主观幸福感问卷对四川省什邡市洛水镇村民和温州地区居民的社会支持和主观幸福感调查了解, 社会支持源被划分为 8 个, 共有 2 个项目, 主观幸福感包括 3 个分量表, 分别是 12 个项目的积极情绪和消极情绪以及 5 个条目的生活满意度。**结果:** 1) 灾区社会支持按照来源可分为人情支持与公共支持; 2) 在灾难后, 什邡地区的群众更依赖于公共支持而温州地区群众更依赖于人情支持; 3) 公共支持与消极情绪之间存在显著的负相关。**结论:** 除了与温州地区一样都依赖于人情支持外, 四川灾区群众更依赖于公共支持, 尤其是中央政府的支持, 并且公共支持有助于缓解受灾群众的消极情绪。

关键词 自然灾害; 社会支持; 人情支持; 公共支持; 主观幸福感

分类号 B849; R395

1 前言

2008 年 5·12 汶川大地震是中国自新中国成立以来有历史记录的最大地震, 直接严重受灾地区达 10 万平方公里, 直接受灾人群达到 4000 万。地震发生后, 从中央政府到地方基层全力以赴地为灾区人民尽可能多的提供帮助和支持; 同时, 民间的公益组织、志愿团体纷纷赶赴灾区, 为灾区人民提供支持和援助。灾区群众也动用自己的亲属、朋友、邻居等社会网络关系来获得支持。同时, 温州地区也遭受了飓风自然灾害的影响, 当地群众依靠基层政府的组织和亲戚朋友的帮助, 迅速恢复生产生活。这些帮助、支持和援助均可被称为社会支持, 其定义为一种“满足个人需要的资源或具有资源提供功能的社会关系”(Caplan, 1974)。由政府、学校、企业、社区和非盈利组织等团体提供的支持被划分为正式支持关系, 而基于血缘、亲缘、业缘、地缘和私人关系提供的社会支持称为非正式支持 (Jacobson, 1986)。

社会支持的获得对于受灾者的灾后恢复起到非

常关键的作用 (Drabek & Key, 1984; Soloman, 1986; Wang, Gao, Zhang, Zhao, Shen, & Shinfuku, 2000)。有良好社会支持的个体会有比较高的主观幸福感 (段建华, 1996)、生活满意度、积极情感和较低的消极情感, 这是因为社会支持可以提供物质或信息的帮助, 增加人们的喜悦感和归属感, 提高自尊感和自信心。已有大量研究表明, 社会支持与主观幸福感之间有显著的相关关系 (Pinquart & Sorensen, 2000; Post, Marcel, Ros, Wynand, & Schrijvers, 1999; 宫宇轩, 1994; 池丽萍, 辛自强, 2002)。社会支持可以阻止或缓解应激反应, 增加健康的行为模式, 从而增加正性情感并抑制负性情感, 防止主观幸福感的降低 (段建华, 1996)。

5·12 汶川大地震和温州飓风灾害中, 受灾地区群众的亲人和朋友受伤或遇难, 基层政府一时之间的工作和组织不到位, 这使得他们的社会支持系统都在一定程度上遭到破坏, 而这会影响到受灾群众的主观幸福感。因此, 本研究对四川地震重灾区什邡市洛水镇受灾村民和温州飓风灾区的群众进行追踪走访, 以研究自然灾害后的社会支持系统现状及其对灾民主观幸福感的影响。

2 研究方法

2.1 被试

来自四川地震重灾区 (什邡) 和飓风灾区 (温

收稿日期: 2008-12-09

* 国家自然科学基金课题 (30840001)、科技部 863 重点项目 (2008AA021204)、中国科学院抗震救灾应急研究项目 (O8CX112011)。

通讯作者: 王文忠, E-mail: wangwz@psych.ac.cn

州)的391名被试接受了施测(有效被试和性别分布见表1),平均年龄为 43.62 ± 16.70 岁。

表1 被试的地区和性别分布

	什邡	温州	Total
被试人数	291	100	391
有效被试	250	97	347
男	107	38	146
女	141	48	192
Missing	2	11	11

2.2 研究工具

灾区施测要求工具既要简短易行,又要全面、可靠,还要语言强度切合中国实际。本研究选择测量主观幸福感的工具包括12个条目的简式积极情感消极情感词表(PANAS-S)和5个条目的生活满意度量表(SWLS)。

简式情感词表由卡尼曼等人编制(Kahneman, Krueger, Schkade, Schwarz & Stone, 2004),中文版经吴胜涛(2009)修订后,采用Likert式0-4点记录被试当下的情感状态(0=一点没有,4=非常强烈),积极情感(如温暖、自得其乐)和消极情感(如失落、愤怒、担忧、疲惫)。两个分量表的内部一致性系数分别为0.70和0.83。生活满意度量表(SWLS),原量表由Diener等人编制(Diener, 1985),迄今已在包括中国在内的全球150多个国家应用过,被广泛地证明具有良好的信度和效度(Pavot & Diener, 1993),本研究在施测时采用Likert式1-6点记分(1=非常不赞同,6=非常赞同)。

又根据四川灾区实际情况及以往社会支持相关研究的结果(肖水源, 1994; 池丽萍, 辛自强, 2002),本研究设计了2个灾区社会支持来源调查项目。量表按照关系的远近,把社会支持来源分为家人、亲属、朋友/同事、邻居/老乡、基层政府、中央政府、外地政府和民间援助等8类,用Likert式0-3点记录被试在他们遇到困难时对这8类支持源作用的评价(0=没有,3=非常大)。在随后的回访中,请被试在这8类支持源中列举3个当他们遇到困难时会首先求助的对象;同时,为了与外部支持相对照,附加了“自己”这一选项。

2.3 研究步骤

首先,在地震发生1个月,对四川地震重灾区什邡市洛水镇291名村民进行初访,让被试对8种支持源(家人、亲戚、朋友/同事、邻居/老乡、基层政府、中央政府、外地政府和民间组织)的作用

进行评价。

然后,在地震发生3个月,对初访的被试进行回访。同时,对飓风灾区(温州)群众的主观幸福感和社会支持状况进行取样调查,让被试在8种支持源和“自己”中列举3个当他们遇到困难时会首先求助的对象,对调查结果进行0-1编码。

最后,利用Unicet 6.18对被试在上述9个支持源或条目上的编码数据进行社会网络分析,计算两地被试在各支持源上的网络密度。

3 研究结果

3.1 初访结果

对252名重灾区有效被试的社会支持源评价数据进行随机分半,一半用来探索性因子分析,一半用来验证性因子分析。主成分分析得出两个因子:人情支持(家人、亲戚、朋友、邻里),公共支持(基层、中央、外地、民间),二者方差解释率为50.23%。各条目的因子载荷及因子内部一致性系数如表2。

表2 社会支持的因子结构

	人情支持	公共支持
亲戚亲属评价	0.84	
家人亲人评价	0.75	
朋友同伴评价	0.65	
邻里老乡评价	0.64	
外地政府评价		0.76
民间援助评价		0.75
中央政府评价		0.63
基层干部评价		0.41
内部一致性系数(α)	0.71	0.55

验证性因子分析表明,家人与亲戚相关以及两因子互相独立的模型是较好的模型,各项指标如表3所示。Hu和Bentle曾推荐联合使用SRMR(标准化残差均方根)和以下指数中的一个——NNFI、IFI、CFI、Gamma Hat(即AGFI)、Mc和RMSEA——来检验模型,即二指数准则;并提出了一个苛刻的界值,NNFI、IFI、CFI和Gamma Hat为0.95,Mc为0.90,SRMR为0.08, RMSEA为0.06(温忠麟,侯杰泰,马什赫伯特, 2004)。据此,可认为本模型达到了可接受的水平。

表3 社会支持的验证性因子分析结果

df	χ^2	SRMR	RMSEA	NNFI	IFI	CFI	AGFI
18	30.26	0.07	0.07	0.91	0.95	0.94	0.89

3.2 回访结果

3.2.1 人情支持与公共支持的地区差异和年龄差异

对社会支持的两因子(人情支持和公共支持)

进行相关分析,结果显示,两因子之间存在显著的负相关 ($r = -0.46, p < 0.01$)。因此,以年龄(18~35岁青年组,36~55岁为中年组,56岁以上为老年组)、性别和地区为组间变量,以人情支持和公共支持为组内变量做多因素重复测量的方差分析,用以检验人情支持与公共支持的年龄差异、性别差异和地区差异。方差分析的结果表明,人情支持与公共支持的组内效应显著,并且它们与年龄、地区的交互作用显著,而与性别之间不存在显著的交互作用(见表4)。老年人依赖人情支持的得分最低,而依赖公共支持的得分最高(见图1);洛水地区的人情支持得分低于温州地区的人情支持得分,而洛水地区的公共支持得分明显高于温州地区的公共支持得分(见图2)。

表4 社会支持两因子的地区差异与年龄差异

	变异来源	MS	df	F
组间效应	年龄	0.056	2	0.110
	性别	0.037	1	0.072
	地区	0.227	1	0.444
组内效应	社会支持	15.381	1	15.319***
	社会支持×年龄	3.453	2	3.439*
	社会支持×性别	0.451	1	0.450
	社会支持×地区	17.316	1	17.245***
变异		1.515	303	

注: * $p < 0.05$, *** $p < 0.001$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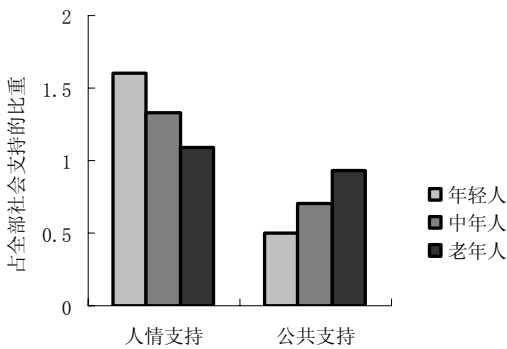


图1. 社会支持的年龄差异

3.2.2 人情支持和公共支持与主观幸福感的回归分析

对社会支持的两个因子(人情支持和公共支持)与主观幸福感(积极情绪、消极情绪和生活满意度)做多层回归分析,以生活满意度、积极情绪和消极情绪为因变量,以人情支持和公共支持分别为预测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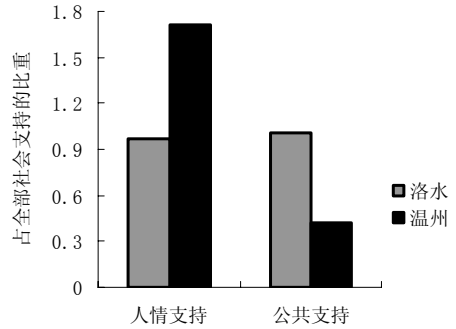


图2 社会支持的地区差异

变量,采用 Enter 法强制将人情支持与公共支持放入方程,建立线性回归方程。回归分析的结果表明,在控制了年龄与性别后,公共支持与消极情绪之间存在显著的负相关,但人情支持与负性情绪之间不存在显著的相关关系。而人情支持与公共支持均与生活满意度和积极情绪之间不存在显著的相关关系,不能预测生活满意度和积极情绪(见表5)。

表5 人情支持和公共支持对主观幸福感的回归分析

因变量	df	控制变量		预测变量	
		性别 (β)	年龄 (β)	人情支持 (β)	公共支持 (β)
生活满意度	314	-0.06	0.30*	-0.05	0.02
积极情绪	311	0.06	0.12*	-0.05	0.04
消极情绪	314	-0.24*	0.01	0.04	-0.14*

注: * $p < 0.05$, ** $p < 0.01$

3.3 两个灾区社会网络密度分析

将编码后的社会支持数据转换为个体与支持源的二模矩阵,利用社会网络分析软件 unicit 6.18 进行分析。结果显示,同样都面临灾难的洛水和温州表现出不同的社会支持模式(见图3、图4)。洛水地区的社会网络密度低于温州地区的社会网络密度(0.25<0.30),但来自中央的社会支持发挥了极大的作用(0.64);而温州地区的社会网络密度高于洛水地区,他们的社会支持网络主要集中在家庭、亲戚、朋友这几个支持源上(0.30)。

4 讨论

本文对四川灾区的社会支持做因素分析,结果表明,四川灾区的社会支持系统可以划分为正式支持和非正式支持,即公共支持和人情支持。这一结果与 Jacobson 提出的把社会支持系统分为正式支持

和非正式支持 (Jacobson, 1986) 的理论一致, 分别对应人情支持和公共支持。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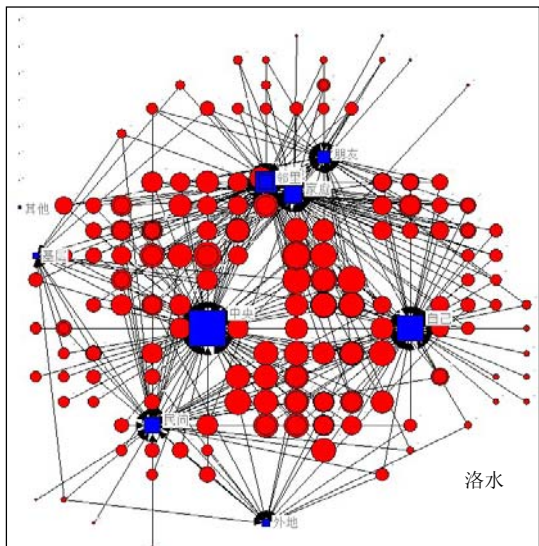


图 3 洛水地区社会网络密度图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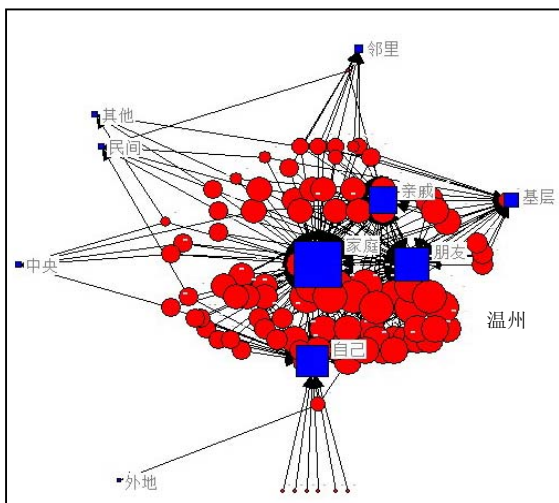


图 4 温州地区社会网络密度图

赵延东 (2007) 对自然灾害的社会资本研究结果表明, 中国文化下的民众或受灾民众更依赖传统的家族、村落式的支持。这一点在温州地区得到了验证, 温州地区群众在恢复重建中更依赖于人情支持, 更倾向于从人情支持系统中获得支持与帮助, 这反映了中国人“家文化”的传统。但是, 四川地震灾区群众的人情支持得分明显低于温州飓风灾区的人情支持得分, 而公共支持得分明显高于温州地区群众的得分, 这表明四川灾区群众已经习惯了

人情支持源遭到了严重的破坏, 人情支持已经不足以满足他们的需要, 而倾向于依赖社区、政府等为他们提供的社会支持, 即公共支持。而温州地区灾情与四川地震灾区的灾情相比较轻, 造成的人员伤亡情况也较少, 因此, 温州地区群众的人情支持系统遭受到的破坏程度低于四川地震灾区, 当地群众在灾后的恢复建设中仍然可以从人情支持系统中获得所需的支持与帮助。从年龄角度来看, 两个受灾地区老年被试的人情支持得分低于其他两个年龄组, 而公共支持得分是三个年龄组中最高的, 这可能是由于老年人的人情支持系统破坏严重, 再加上本身就需要更多的支持和帮助, 这就使得他们比其他两个年龄组更依赖于公共支持。

进一步, 对两地的社会支持网络密度分析表明, 洛水地区的社会支持网络密度较小, 这表明当地群众寻求社会支持的范围比较大, 除了人情支持之外, 当地群众更依赖于向中央政府寻求支持; 而温州地区的社会支持源主要集中在人情支持上, 而且倾向于依赖基层政府而非中央政府的支持。这说明四川重灾区的群众在大灾难面前, 与温州飓风灾区的群众一样也会向家人、朋友等人情支持网络寻求支持, 但由于大地震使他们原有的人情社会支持系统不完整, 因此更多的是向中央政府这样的公共支持源寻求帮助。这一结果可能从侧面反映出了人情支持在危机事件和生命历程中的脆弱性, 不足以在灾难面前帮助人们渡过难关。

这些结果说明, 对于那些处于危机状态或个体资源不足的个体来说, 仅仅有人情支持是不够的, 社会团体、组织提供强有力的公共支持是必要的。目前, 国内对社会支持与主观幸福感的研究主要集中在家人、亲属、朋友、同事等人情支持领域 (辛自强, 池丽萍, 2001; 严标宾, 郑雪, 邱林, 2003), 只有少量研究考虑到来自政府、社区和非盈利组织等公共支持的影响 (崔丽娟, 李虹, 1997)。本文则同时从人情支持和公共支持两个支持源的角度考察了与主观幸福感之间的关系, 结果表明, 公共支持与消极情绪之间的显著负相关关系, 而人情支持则与消极情绪之间没有显著的相关关系; 并且公共支持和人情支持与积极情绪和生活满意度之间都不存在明显的相关关系。这初步反映出公共支持与消极情绪之间的密切关系, 更进一步的说明了社区、政府等所提供的支持对于缓解受灾群众的消极情绪很有帮助。

5 结论

通过对两个受灾地区（洛水与温州）群众的社会支持数据进行因素分析、差异检验和社会支持网络密度的分析发现，灾区群众在遇到问题和困难的时候依赖于人情支持和公共支持。但对于受灾严重的洛水地区群众来说，人情支持已经不足以为他们提供所需要的支持和帮助了，他们更依赖于公共支持的帮助，尤其是中央政府的支持。而且公共支持有助于缓解灾区群众的消极情绪，因此，很有必要加强灾区的公共支持建设，让灾区群众能够获得更多更有效的支持。

参考文献

池丽萍, 辛自强. (2002). 幸福感: 认知与情感成分的不同影响因素. *心理发展与教育*, 3, 27-32

崔丽娟, 李虹. (1997). 城市老年人社会支持网络与生活满意度的研究. *心理科学*, 20, 123-126

丁新华. (2007). 大学生社会支持状况与主观幸福感的相关研究. *中国健康心理学杂志*, 15, 097-397

段建华. (1996). 主观幸福感概述. *心理学动态*, 4, 46-51

宫宇轩. (1994). 社会支持与健康的关系研究概述. *心理学动态*, 2, 34-39

吴胜涛, 王力, 张建新. (2009). 灾区民众的情感表达及其与非灾区的比较 Unpublished manuscript.

温志麟, 侯杰泰, 马什赫伯特. (2004). 结构方程模型检验: 拟合指数与卡方准则. *心理学报*, 36, 186-194

肖水源. (1994). 《社会支持评定量表》的理论基础与研究应用. *临床精神医学杂志*, 4, 98-100

辛自强, 池丽萍. (2001). 快乐感与社会支持的关系. *心理学报*, 33, 442-447

严标宾, 郑雪, 邱林. (2003). 社会支持对大学生主观幸福感的影响. *应用心理学*, 9, 22-28

赵延东. (2007). 社会资本与灾后恢复——一项自然灾害的社会学研究. *社会学研究*, 164-187.

Caplan G. (1974). Support systems and community mental health: Lectures on concept development. *New York: Behavioral Publications*

Drabek, T. E., & Key, W. M. (1984). *Conquering Disaster: Family Recovery and Long-Term Consequences*. New York: Irvington.

Diener, E. D., Emmons, R. A., Larsen, R. J., & Griffin, S. (1985). The Satisfaction with life scale. *Journal of Personality Assessment*, 49, 71-75.

Jacobson, D. E. (1986). Types and timing of social support. *Journal of Health and Social Behavior*, 27, 250-264

Kahneman, D., Krueger, A. B., Schkade, D. A., Schwarz, N. & Stone, A. A. (2004). A Survey Method for Characterizing Daily Life Experience: The Day Reconstruction Method. *Science*, 306, 1776-1780.

Pavot, W., & Diener, E. D. (1993). Review of the satisfaction with life scale. *Psychological Assessment*, 5, 164-172

Pinquart, M., & Sorensen, S. (2000). Influences of socioeconomic status, social network, and competence on subjective well-being in later life: A meta-analysis. *Psychology and Aging*, 15, 187-224

Post, Marcel, W. M., Ros, Wynand, J. G., & Schrijvers. (1999). Impact of social support on health status and life satisfaction in people with a spinal cord injury. *Psychology & Health*, 14, 679-695

Soloman, S.D. (1986). Mobilizing social support networks in times of disaster. In C.R. Figley (ed.), *Trauma and its wake*, 2, 232-263.

Wang, X. D., Gao, L., Zhang, H. B., Zhao, C. Z., Shen, Y. C., & Shinfuku, N. (2000). Post-earthquake quality of life and psychological well-being: Longitudinal evaluation in a rural community sample in northern China. *Psychiatry and Clinical Neurosciences*, 54, 427-433

Social Support System of People in Sichuan Earthquake Area and Its Relationship with Subject Well-Being

XIN Jiu-Ling^{1,2} WU Sheng-Tao^{2,3} WU Kan-Kan^{2,4} WANG Wen-Zhong² ZHANG Jian-Xin³

¹ Crisis Intervention Center of Institute of Psychology, Chinese Academy of Sciences, Beijing 100101, China)

² Graduate School of Chinese Academy of Sciences, Beijing 100101, China)

³ Key Laboratory of Mental Health of Institute of Psychology, Chinese Academy of Sciences, Beijing 100101, China)

⁴ Social and Economic Behavior of Institute of Psychology, Chinese Academy of Sciences, Beijing 100101, China)

Abstract: Object: To understand social support system and its association with subjective well-being of areas experienced traumatic earthquake at Sichuan, China on May 12, 2008. **Methods:** Residents, who lived in Luocheng town, Shifang, Sichuan or Wen Zhou, are administered by self-designed social support inventory and self-designed subjective well-being inventory. The subjective well-being with three sub-scales includes positive emotion, negative emotion and life satisfaction. **Results:** 1) Social support system of earthquake areas at Sichuan can be divided into personal social support and public social support by the source of social support. 2) People living in Shifang, Sichuan are much more dependent on public social support whereas people living in Wenzhou are much more dependent on personal social support. 3) Personal social support and public social support can significantly predict negative emotion. **Conclusion:** People lived in areas happened earthquake at Sichuan are more dependent on public social support than people lived in Wenzhou, China. But people lived in both areas are dependent on personal social support. Besides, public social support is helpful to release negative emotion.

Key words: Sichuan earthquake; social support; personal social support; public social support; subjective well-being